

青年媒介化愤怒的产生与表达

——基于“孔乙己文学”事件的扎根研究

刘鸣箏 王 硕

摘要:“孔乙己文学”事件是青年媒介化愤怒的典型案列,针对此事件的研究,有利于梳理青年媒介化愤怒演化路径,归纳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归因。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可建构青年媒介化愤怒的路径演化图和青年媒介化愤怒-社会公共议程参与实践理论模型,并提炼青年群体媒介化愤怒背后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归因。研究发现:媒介化愤怒是青年群体现实情绪的媒介化展演,其发端于青年因现实生活与价值观念冲突而产生的茫然,并在媒介空间中延展为重铸“客我”的集群性媒介运动。网络媒介在媒介化愤怒的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风险放大器与情绪发酵皿的作用,催动着愤怒的媒介化变革。随着社会媒介化的不断深入,媒介化愤怒可能成为网络媒介空间中的显性事件。如何打破青年的情绪茧房,运用话语转换策略,疏解媒介化愤怒,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媒介化愤怒;网络舆情;青年舆论参与;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1-0066-14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23ZD10)

人类的社会生活总是充斥着各种情感。情感表达作为公共话语实践方式之一,是大众公共舆论参与的重要媒介^[1]。当下,网络媒体正成长为大众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相比于其他群体,青年群体更擅于利用网络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绪^[2],而愤怒成为其中极容易凸显的情绪之一^[3]。个体在舆情事件中表达的愤怒经由网络媒介的加工后发生质变,形成有别于情绪主导的“媒介化愤怒”。媒介化愤怒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更是一种推动媒介运动的情绪力量^[4],其背后所蕴含的情绪模因与社会文化归因非常值得关注。近年来,网络集群性事件频发,通过互联网平台参与讨论、表达不满,并最终形成媒介化愤怒,成为青年舆论参与的显著特征之一。这种愤怒很容易被互联网平台放大、聚焦和扭曲,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一个偶然的事件就可能成为导火索,形成集群性的网络抗争事件^[5]。媒介化愤怒作为青年网络舆论中一种典型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情感表达形式,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情感逻辑和文化归因。研究这些要素对疏解青年网络集群事件至关重要,值得深入探讨。

一、问题缘起

2023年3月初,“孔乙己文学”在网络上爆火。作为鲁迅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孔乙己的穷书生形象引发青年群体在网络上的强烈共鸣。截至2023年3月6日,抖音上“孔乙己文学”相关视频播放量迅速突破5000万。随着话题的升温,舆情开始演化出不同的路径。3月12日视频下一名网友“失意书生”评论:“都说学历是敲门砖,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一时间引发网友热议,“孔乙己文学”成为热梗,冲上各大平台热搜。3月16日央视网在新浪微博发布“#央视网谈孔乙己文学”话题:“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

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枷锁。”这一评论瞬间引发了网民的愤怒,网络上随即出现大量情绪性抗争话语。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自媒体发文称现代年轻人共情孔乙己文学是想做巨婴,是矫情的体现。双方就孔乙己悲剧的原因到底是自己“自视清高,不愿劳作”,还是社会大环境不给年轻人机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此次事件逐渐演化为网络集群性舆论事件。随后,央视网再就此事发布文章《正视“孔乙己文学”背后的焦虑》,将舆论焦点拉回青年群体的就业焦虑和学历焦虑。网友纷纷就此文章发表观点,不同观点激烈碰撞,相关话题的网络浏览量超2亿次,至此舆论发展至顶峰。2023年4月,相关舆论逐渐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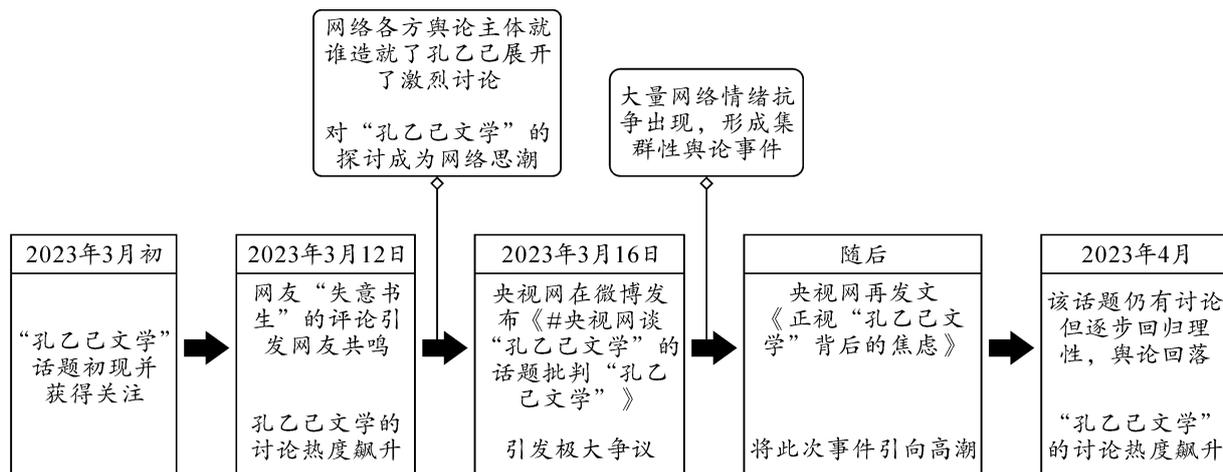


图1 “孔乙己文学事件”舆情演化图

“孔乙己文学”事件混合了青年的学历焦虑、就业焦虑和认同危机,体现了目前很大一部分青年的心理状态;主流媒体的介入更使得该事件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青年亚文化之间冲突、碰撞和妥协的舆论场域。因此,“孔乙己文学”事件中的青年舆论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研究其形成过程与其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归因不仅对于我们了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亚文化认同颇有裨益,而且能够为剖析媒介化愤怒的形成与化解做出理论贡献。

二、文献综述

(一)从愤怒到媒介化愤怒

愤怒是个体感受到的一种负面的、不愉快、令人苦恼的体验^[6],是当个体在社会交往中遭受他人侵犯时,触发的心理防御机制^[7]。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下,愤怒的情感正以虚拟的方式被媒介塑造着^[8]。网络媒介形塑着愤怒的传播样态、情绪体验与情绪内核,并赋予其新的媒介社会属性。被媒介化的愤怒正以全新的样态弥散在媒介空间之中。

网络媒介的公开性提高了社会情绪的能见度^[9],加速了愤怒等负面情感的分享与传染^[10]。愤怒的消极信息越多,受众越容易受到情绪感染,情绪同质化越严重,也更容易陷入情绪茧房^[11]。同时,互联网媒体又不断地将具有争议的社会话题带入公众视野,甚至不惜建构情景、虚构事实、制造身份对立来形成集体抗争^[12]。在此环境中受众的愤怒敏感度大大提升,而情感智力和控制力却被环境削弱。因此,愤怒情绪更容易为人所吸纳,从而使其传播效能大幅提升。并且,情绪社会分享理论(Social Sharing of Emotion Theory)认为人们在遇到情绪性事件后,往往会向其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感受^[13]。情绪广播理论(Emotional Broadcaster Theory)认为互联网媒介节点-网络的信息传播形

式加速了情绪的分享扩散,情绪的效价越高扩散的速率越快,范围越大^[14]。愤怒作为一种情绪唤起度极高、效价极强的情绪质素,在网络媒介的传播中更容易刺激受众的神经,引发其生理情绪反应,并进一步促使受众分享愤怒情绪。于是,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媒介空间中愤怒情绪传播动力源,造就愤怒情绪的“自来水”式传播。

在与媒介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愤怒的情绪体验逐渐被改写。被媒介化的愤怒区别于个体的“愤恨”,更多地呈现为集群性的“义愤”。不同于因自身利益被侵犯而产生的愤恨,义愤是人们对于违背社会正义和基本规范之事所产生的强烈感受,其不是为自身遭受的不公和不义而愤怒,而是为他人遭受的不公和不义而愤怒^[15]。网络媒介将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事件带入公众视野,不断刺激公众的神经,人为地夸大舆情事件违背社会道德的程度,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此时,公众在舆情事件中的愤怒情绪并非完全源于事件本身,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正义呼唤而生成的义愤。因为,比起为己的愤恨,表达为他的义愤更能证明自我的道德感,愤怒的公众在一次次义愤中提升自己在共同体中的道德声誉,也渐渐培养出了自我的道德优越感和满足感。在网络空间中,媒介为愤怒提供了正当的道德理由,使得公众的义愤体验不仅仅是在体验情绪本身,还体验着情绪所带来的道德审判的快感和获得感。在舆情事件中,利用愤怒的道德审判凸显自身的价值立场,是网络媒介在这个时代赋予公众独有的道德化愤怒体验^[16]。

在网络媒介中,情感的流通并不仅仅是个体情感本体的流通,也是情感载体(情感表达的语言)的流通。语言是建构情绪的重要手段^[17]。话语可操作的特性,使得寓于媒介之中的情绪隐含着权力关系,它允许我们感受某些情绪,塑造我们的情绪表达^[18]。后真相时代,网络媒体常常策略性地运用感官化叙述、放大社会因素、模糊核心事实等叙事策略极力唤起人们的愤怒情绪^[19],而随着情绪与情绪的不断交汇、叠加,个体愤怒又会逐渐升级为集体质疑^[20]。媒介延展了公众愤怒反应的进程,将其转变为公众集群性媒介行动的符号化中介。此时,被媒介化的愤怒渐渐褪去了愤怒作为个体情感的旧衣,展现出其作为媒介运动召集符号的独特媒介属性。

既有生产与传播的媒介技术土壤,又有建构性话语的不断浇筑,因而愤怒在媒介的推动下偏离其原有的轨道,升维成深度媒介化社会中一种被媒介建构与异化的媒介化愤怒。

(二)青年网络舆论中的情感特征

公众的情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公共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21]。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容易被情感所左右,情感既能连接不同群体,也能造成群体的割裂^[22]。高度情绪化的舆论参与,加剧了网络舆论场的紧张氛围,极易激发情绪化的争论和冲突。数字媒介所带来的情感化传播表征,使得青年在虚拟网络情境的交往活动中的个体理性有所消解,助推了青年舆论的情绪极化^[23]。青年人经常通过各种网络舆论事件表达自己的愤怒,这种情绪通过评论、转发等方式在网络上迅速传播,进而引发舆论扩散效应^[24]。同时,在媒介技术的赋能与人为建构话语的引导下青年群体舆论中的情绪表达展现出个体价值观念述怀的外延。他们通过网络舆论参与来表达自我,展示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倾向,利用情绪话语建构弱者身份,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参与到社会行动和公共事务中,谋求群体利益的实现^[25]。

新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情感表达的规则,其促成了以愤怒为重要特质的网络舆论,值得我们做更多的研究^[26]。愤怒是青年舆论中不可忽视的情感,被媒介化的愤怒更是已经转演为青年群体表达自我、参与抗争的常用手段之一,并成为推动媒介运动形成的显性情绪动力,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因此,作为青年网络舆论中一种典型的且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情感样态,媒介化愤怒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情感逻辑和社会文化归因,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将从青年群体广泛参与的网络舆情事

件入手,扎根于媒介化愤怒的主体行动者“青年群体”,利用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青年群体媒介化愤怒表达的文本资料,依据扎根理论探究青年媒介化愤怒现象的演化路径,并厘清媒介化愤怒背后的情感逻辑,进而归纳其深层次的社会与文化归因。

三、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的选取

根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定义,本研究选取年龄在15至31周岁之间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为了确保研究样本的多样性并满足扎根理论的需求,研究采取分层抽样(stratified purposeful sampling)、典型案例抽样(typical case sampling)、强度抽样(intensity sampling)和极端案例抽样(extreme case sampling)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通过学历、就业情况和性别等要素对研究对象进行差异化选择,以便分析不同客观因素对青年媒介化愤怒表达的影响。最终研究选取的21名研究对象详细情况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户籍	就业情况	网络使用 频度	网络舆论参与 频度	是否就“孔乙己文学” 事件公开发表个人观点
B1	男	19	大学本科在读	吉林吉林	/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B2	男	23	大学本科 (应届毕业生)	山西临汾	已签约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B3	女	20	大学本科在读	天津宝坻	/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B4	男	22	大学本科 (应届毕业生)	江苏徐州	升学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B5	女	22	大学本科 (应届毕业生)	河南安阳	暂未就业	经常使用	偶尔参与	是
B6	女	24	大学本科	山东青岛	暂未就业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B7	男	25	大学本科 (往届毕业生)	新疆石河子	已就业	经常使用	经常参与	是
Y1	女	26	硕士研究生 (应届毕业生)	陕西榆林	暂未就业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Y2	男	25	博士研究生在读	浙江宁波	/	经常使用	经常参与	是
Y3	男	24	硕士研究生 (应届毕业生)	黑龙江鸡西	已就业	重度使用	偶尔参与	了解事件过程 但未发表观点
Y4	男	30	博士研究生 (应届毕业生)	江苏苏州	暂未就业	重度使用	偶尔参与	了解事件过程 但未发表观点
Y5	女	23	博士研究生在读	吉林长春	/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Y6	女	29	博士研究生 (应届毕业生)	福建泉州	暂未就业	偶尔使用	一般不参与	了解事件过程 但未发表观点
Y7	女	25	硕士研究生	江西九江	已就业	重度使用	偶尔参与	是
W1	男	22	大专学历	江西南昌	自由职业	经常使用	偶尔参与	是

续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户籍	就业情况	网络使用 频度	网络舆论参与 频度	是否就“孔乙己文学” 事件公开发表个人观点
W2	男	27	高中肄业	广西桂林	自由职业	偶尔使用	一般不参与	了解事件过程 但未发表观点
W3	女	21	大专在读	甘肃白银	/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W4	女	25	初中学历	云南玉溪	已就业	经常使用	经常参与	是
W5	男	17	高中结业	湖北黄石	未就业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W6	女	16	高中在读	河南许昌	/	偶尔使用	经常参与	是
W7	男	19	大专在读	河南安阳	/	重度使用	经常参与	是

注：“/”表示此受访者还在学业进行之中

据表1所示,本研究所选取的访谈对象年龄范围、地域范围覆盖广泛;样本学历层次丰富;网络使用频度普遍较高,重度使用及经常使用的对象占85.7%,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占比66.7%,仅有9.5%(2人)不经常参与网络讨论。访谈对象了解此次舆论事件且曾经在网络上发表个人观点的样本达总样本数的81%。综上,样本的选择体现了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均衡性及层次性,可以有效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代表性。

(二) 研究方法

经典扎根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 Glaser 和 Strauss 提出,是成熟、规范且科学的质性研究方法。^[27]作为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研究范式之一,扎根理论的核心原则是从情境中涌现问题并进行无理论预设的研究,力求减少主观性,并通过对数据的比较逐步归纳出理论^[28]。此方法与实证主义哲学观相契合,强调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客观性以及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青年网络舆论是一个多方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征。本研究拟基于扎根理论,并结合深度访谈结果和网络田野调查数据揭示了青年群体媒介化愤怒的演化路径,建构青年媒介化愤怒——社会公共议程参与实践模型,并深入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归因,以期青年舆论的实证研究提供相应补充。

四、研究设计及扎根分析

(一)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首先,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研究对21名研究对象分别开展了不少于30分钟的访谈,使用 Nvivo12 Plus 软件将语音资料撰写成文本,并对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整理成了带有序号的有序文字段落。

其次,网络田野调查。研究针对此次舆论事件,收集了新浪微博中关于本次事件的热点长评论(字数超过100,点赞数超过1000),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作为与访谈文本相互印证的资料。

最后,数据清洗和汇编。研究最终得到了190份有效样本,包括21份深度访谈文本和169条网络数据,共计约4.6万字的文本资料。遵循扎根理论的饱和原则,研究随机选择了70%的文本资料用于分析、编码与理论建构,剩余的30%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和持续比较、分析、修正,直到资料内容不再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达到理论饱和的状态。

(二) 扎根分析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信息初步的归纳整理。本研究将文本资料的原始语句逐一编码,并在不同的抽象概括程度上将开放式编码分为两个层次:初始概念和初始范畴。

首先,研究利用 Nvivo 软件对整合后的文本逐一编码,共得到了 670 个编码序列。接着将原始语句抽象化、概念化并依据主题进行分类,得到了 103 个初始概念。根据语义和逻辑关系重新组合这些概念,相关概念聚拢后共生成了 19 个初始范畴,详见表 2。

表 2 开放式编码结果

初始概念(一级)	初始范畴(二级)
C001 媒体评价失范 C002 媒体话语不客观,有失公允 C003 打破媒体偏见 C004 评价他人的权力 C005 自我评价 C006 不想被评价 C007 争取公平的话语权	媒介话语权争夺
C008 窥探隐私 C009 不想被别人凝视 C010 不被看见的权利	媒介隐私权捍卫
C011 身份自由 C012 身份归属 C013 自我认同 C014 成为任何人想成为的人 C015 不被他人定义	身份定义权争夺
C016 愤怒是我们的态度 C017 用愤怒发声最有效	话语表达策略
C018 这件事是我们圈子内部的事 C019 圈外人瞎评论,让人生气 C020 别人侵年轻人的小圈子	圈画价值圈层
C021 网络互助 C022 青年人抱团取暖 C023 寻找建议 C024 寻求别人的支持 C025 在网络上寻求心理慰藉 C026 我们需要安慰而不是指责	社会支持寻求
C027 恋爱压力 C028 生育成本 C029 养老压力 C030 工作压力 C031 社会内卷 C032 就业困难 C033 未来发展迷茫 C034 生存焦虑 C035 生活不顺心 C036 人太多,竞争太激烈 C037 没钱,赚不到钱 C038 负债 C039 买不起房子	现实生活压力
C040 出身寒门 C041 阶层差距太大 C042 社会鸿沟 C043 难以实现阶层跨越	社会阶层落差
C044 时常怀疑自己 C045 自我否定 C046 自卑 C047 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跟不上时代发展 C048 看不到未来希望 C049 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C050 感觉自己对社会而言没有价值 C051 迷茫,找不到奋斗方向	个体价值感缺失; 群体性迷茫
C052 高等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 C053 大学教育太水 C054 学历无用 C055 不尊重知识 C056 赚热钱 C057 专业烂 C058 学不到技能 C059 学不到真本领	教育与市场 需求的脱节
C060 中国的教育需要改革 C061 分配制度优化 C062 社会问题整治 C063 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 C064 完善劳动法 C065 维护年轻人的权益 C066 社会保障 C067 社会福利 C068 保证打工人的基本权利 C069 国家该对年轻人多点帮扶 C070 多关注普通老百姓	社会问题关注 社会议题探讨
C071 读书也改变不了命运 C072 勤奋只能让老板致富,而不是我 C073 本分老实最没用 C074 诚实守信反而被坑得最惨 C075 好好学习还不如吹嘘拍马有用 C076 踏踏实实学习,结果还一无所有 C077 钱才是王道 C078 谁还相信老一套的观念 C079 之前铭刻心中的价值观被击垮 C080 爱自己最重要	社会价值反思
C081 扮演弱者 C082 表演愤怒 C083 愤怒不过是争取利益的一种策略 C084 利用情绪动员其他人 C085 只有愤怒才能被听见 C086 人多声量大 C087 团结起来才能被人重视	情绪舆论参与

续表	
初始概念(一级)	初始范畴(二级)
C088 抗争才能争取利益 C089 通过这个事情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C090 寻找有同样想法的圈子 C091 茶余饭后用来闲谈	舆论参与意图
C092 互联网仪式感 C093 一场网络狂欢 C094 为了娱乐而评论 C095 为了应和而跟帖	仪式化抗争
C096 从众心理 C097 舆论环境压力 C098 害怕成为异类 C099 感觉被自媒体带节奏了 C100 被别人的话推着走 C101 只有一种声音 C102 互联网经常推送类似的东西 C103 我看到的观点基本和我想的都一样	网络舆论环境引导 网络回音室效应

2. 主轴编码

研究根据各范畴的逻辑关系、属性及维度,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19个初始范畴进一步抽象整合归类,最终提炼出:权力诉求的表达、价值观念的表达、物质生活困境、精神价值迷茫、社会公共议程参与意向、社会公共议程参与诉求、社会公共议程参与仪式、媒介环境激化8个副范畴,然后将所得副范畴进行聚类分析,进一步抽象、整合为青年网络亚文化表达、青年现实生活困境、青年社会公共议程参与、网络媒介拟态环境4个主范畴,详见表3。

表3 主轴编码结果

初始范畴(二级)	副范畴(三级)	主范畴(四级)
媒介话语权争夺	权力诉求的表达	青年网络亚文化表达
身份定义权争夺		
媒介隐私权捍卫		
话语表达策略	价值观念的表达	
圈画价值圈层		
现实生活压力	物质生活困境	青年现实生活困境
社会阶层落差		
教育与市场的脱节		
社会价值反思	精神价值迷茫	
个体价值感缺失 群体性迷茫		
社会问题关注 社会议题探讨	社会公共议程参与意向	青年社会公共议程参与
社会支持寻求	社会公共议程参与诉求	
舆论参与意图		
仪式化抗争 情绪舆论参与	社会公共议程参与仪式	
网络舆论环境引导 网络回音室效应	媒介环境激化	网络媒介拟态环境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通过整合与凝练,在主轴编码的范畴类属中提炼出核心类属(Core Category),通过构建一条主线将分散的范畴概念按照逻辑关系有序组合在一起,以更有效地表达各范畴间的内部逻辑关系,并最终完成整个理论的解释构建。本研究基于对已生成的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抽象归类,将研究核心为题范畴化为:“网络舆情事件激化了处于现实困境和价值迷失中的青年群体,他们通过以媒介化愤怒为策略的网络亚文化表达参与社会公共议程,并期望达成表达自己的主张和诉求,为青年群体争求利益的目的。”同时,研究借用 Strauss 等提出的“条件-行动策略-结果”分析范式^[29],将媒介拟态环境视为条件,将以媒介化愤怒为策略的网络亚文化表达视为行动策略,将青年群体的现实困境视为根本原因,将青年的社会公共议程参与视为结果,最终搭建核心范畴逻辑关系图并阐释其内涵,详见表 4、图 2。

表 4 选择性编码结果

核心范畴	结构关系	内涵
现实生活困境	根本原因	青年群体的现实生活压力,导致了青年群体的社会价值迷失。当个体的现实生活体验与其内在的价值体系产生冲突时,会陷入认知失调的状态,并最终产生对社会敌对情绪和抗争倾向。
网络亚文化表达	行动策略	以媒介化愤怒为策略的亚文化表达已成为青年群体通过网络舆论参与社会公共议程的仪式化手段,是青年人群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抗争的策略之一。
网络媒介拟态环境	条件	网络新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放大了用户对此次事件的风险性感知,削弱了用户理性思考的意识与能力,极化了用户情绪,使得用户情绪在媒介的建构下单向度发展,最终导致了青年群体的愤怒情绪的爆发。
社会公共议程参与	结果	青年群体通过情绪舆论的表达参与社会公共议程,以达成表达个人的观点、诉求,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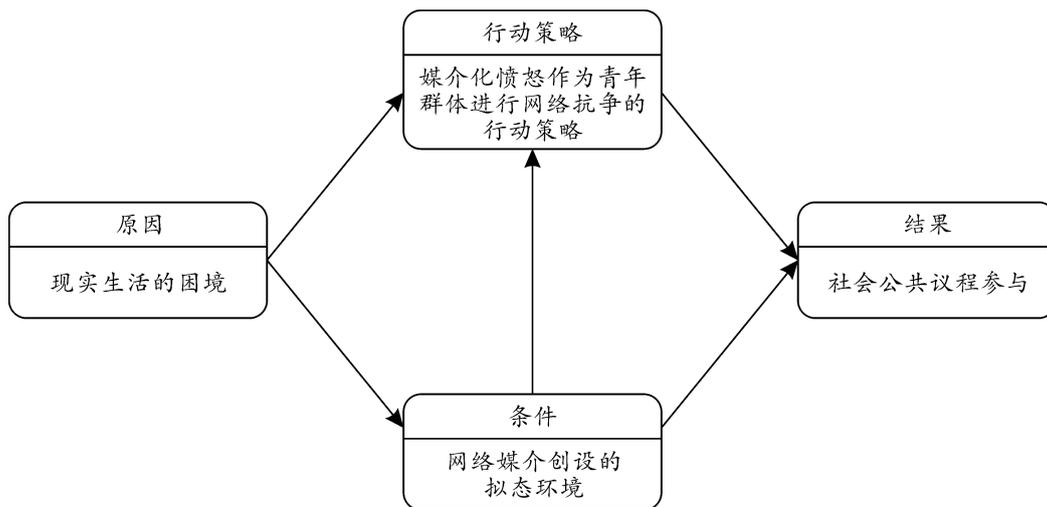


图 2 核心范畴逻辑关系——青年媒介化愤怒路径演化图

4. 理论饱和度和检验

为确保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整合性,本研究使用剩余的 30% 文本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和检

验。研究重复了上述的三级编码,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新的编码产生的概念都能够归入已有的范畴,并且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和范畴。由此判定研究所得的103个概念、19个初始范畴,4个主范畴,已经充分囊括了青年群体媒介化愤怒归因理论建构所需要的必备要素,理论饱和度达标。

五、研究发现及理论模型建构

(一) 研究发现

1. 愤怒的产生:由现实生活与价值观念冲突所引发的茫然之怒

青年的媒介化愤怒育于其对现实的茫然,是现实生活实践与价值观念的冲突所引发的青年群体的社会性迷失。社会思潮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形态,是经济基础的体现^[30]。青年对经济现状、生存状态的不满的表达,经常出现在各种社会抗争事件中,呈现出一种弥散性的抗争形态^[31]。在当前社会经济大环境中,面对就业压力、学历焦虑、认同危机等社会问题,青年更倾向于通过愤怒化的言论来表达不满并争取权益,这极易引发网络集群抗争事件。正如受访者W2表示:“现在经济不好啦,活难找,正好有时间上网上发发牢骚,正好看到这么个事,一看人家网友都说的挺对理,我也就跟着说上几嘴。”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引发了青年对现实生活的困惑,进而诱发青年抗争情绪在网络上的扩散,弥散的抗争情绪通过网络的传播最终累积成群体性抗争事件。

同时,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极大地冲击着青年群体内在的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价值观念的建立与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当社会经济环境转变时,传统的价值观念可能无法满足当下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致使他们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认可和接受度下降,从而催生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的反思与背离。此次事件中,迷失的青年群体将矛头指向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的不信任与价值反思的倾向。如受访者Y4表示:“从小就一直听说世上只有读书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然而我读到了博士却面临着找不到工作,吃不上饭的处境,我越来越怀疑我们之前的宣传是不是有问题。我们一直标榜的勤奋刻苦我都有也付诸在我的求学生涯中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到头来还没有大专同学混得好。”青年在社会价值与生活体验的冲突之间迷失,失去了应对外界压力的动能,陷入自我怀疑和精神内耗的怪圈。精神价值的缺失使青年感到迷茫、无措和失落。正如认知失调理论认为,当个体的态度与其内在的价值观念不一致时,会产生一种割裂的心理状态,进而转化为敌对社会的情绪和抗争倾向^[32]。现实生活体验与社会价值观念的抵牾使青年群体产生社会性迷失,陷入由负面情绪话语建构的信息茧房,进而引发了媒介化愤怒。

2. 愤怒的表达:展演于媒介舞台中的愤怒表演

网络媒介的兴起,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便捷、开放的社会公共议程参与平台,充分地赋能青年群体的公共议程参与。86%的受访者表示具有想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和意愿,但仅有5%的人愿意在现实生活中公开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和观点,而却有81%的人愿意在互联网媒体上发声。受访者普遍认为在互联网上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发表言论而不用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如受访者B1所说:“在现实生活中,我几乎不表露自己的观点,我非常害怕别人知道我持有某种观点。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和情绪是危险的。而当我上网时就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网络上的人离我很远而且网上人多,大家不会只注意到我一个人的,即使被人关注了过一会儿也就忘了,互联网没有记忆的嘛。”青年群体认为网络媒介极大地帮助他们规避了社会群体的围观和审视,为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提供了足够的安全感,符合他们“不外露”的社会公共议程参与风格。因此,青年将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看法和情绪自然地投射到网络媒介中,网络媒介成为他们表达个人观点、释放现实情绪的主要场所。此外,在网络舆论传播中,越是情绪化表达越能够引起网络空间中大众的共鸣,从而形成大面积传播。因为在舆论世界中情绪的表达常常被识别为是“弱者”的呼喊与求助,而弱者永远在舆论中占据优势地位^[33]。因此,直截了当的愤怒表达相比于那些逻辑清晰、有理有据的道理性话语更能在网络媒介中发挥弱者优势,经由愤怒包装后的舆论往

往更具传播力,成为渗透人心的传播力量。得益于网络媒介提供的丰富的可供性技术,青年得以自由地利用各种媒介符号载体负载愤怒情绪创设情绪化、煽惑性的话语符号,开展他们的愤怒表演。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网民将“表演愤怒”作为一种亚文化表达策略,以此参与到社会公共议程中来。通过愤怒的表演,青年们得以饰演起弱者身份,博取大众的情感支持,促使愤怒话语背后他们所真正想要传达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立场在社会公共空间之中的传播。正如 W3、Y1 所说:“其实在网上很多生气都是演出来的,因为咱们现在不是流行谁怒谁就是被欺负的,谁是被欺负的谁就是有理的嘛。”“只有被欺负的人才能博到别人的同情,得到别人的同情才有机会让别人听我们说话。”在深度媒介化的背景下,青年的社会公共议程参与方式已由线下转为线上,表演愤怒已成为青年参与社会公共议程的要端策略之一,而网络媒体平台则成了青年社会公共议程参与的主场域和展演愤怒的舞台。

3. 情绪之后:愤怒在媒介空间中的延展

网络媒介构建了非理性的虚拟舆论参与场景,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愤怒的“行为化”。在这一场景中,愤怒不再仅是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升维成了推动媒介运动形成的行为力量。首先,青年群体以愤怒的形式表达个人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和主张,并通过愤怒这一情绪信号快速识别与自身有着相同情感取向的群体。受到愤怒情绪号召的青年群体迅速聚集,形成舆论集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其舆论阵地。接着,青年群体将愤怒话语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并以此展开仪式化的互动。通过分享共通的情绪体验,他们不断强化彼此间的情绪认同与身份认同,在愤怒话语的互动中构建起群体合意,并在愤怒情绪的驱动下,唤起媒介空间中每个个体对于所在群体利益合法性权威的忠诚,生产出一种仪式化的团结。正如受访者 Y7 所说:“俗话说得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个孩子哭可能没奶吃,那一百个孩子一起哭呢?总该有了吧。所以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到我们应有的东西。”青年群体借助愤怒共鸣来找到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共意体”,并通过抗争性话语的话语互动构建出具象化的愤怒情境。在情境化的愤怒体验中,受众逐渐对话语操持下的愤怒产生正当性认同,并将愤怒背后的价值观念内化为个体对舆情事件的认知定势。在愤怒话语的互动中,青年群体形成了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集体认知模式,其形塑着个体对特定事件的认知,驱动着个体将愤怒情感体验实体化为抗争性的媒介“共意性运动”。他们通过集群性的道德施压,将群体价值潜藏在正义修辞下的话语论群之中,使愤怒变得正当化,并构建出契合自身利益的合法化舆论场域。当愤怒情绪成为网络社交和仪式化互动的工具时,媒介化愤怒便应运而生。它不仅改变了个体情感表达的方式,还推动着集群形式的舆论集结,成为弥散于媒介空间中建构着情绪运动的行为力量。

此外,愤怒在媒介空间中的延展不仅是单纯的集群性运动,情绪之后还反映着青年群体以亚文化表达为引子的对社会评价体系的挑战与“客我”的重铸。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表达常常依托于网络亚文化的表达^[34]。过去,青年们的网络亚文化表现出“圈地自萌”的特点,其总体来说是以温和的表达方式在小范围内传播的,很少表现出追求主流文化关注和认可的态度。但在“孔乙己文学”事件中形成共意体集群的青年迫切地期望通过以愤怒为策略的亚文化表达来输出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并扩大其影响力。青年们从被动地期待得到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可,转变为主动寻求价值观念表达的权力,并挑战当下的社会评价体系。他们想要通过网络舆情事件构建权属于他们的所认可的价值体系的亚文化圈层,界定自己的亚文化领域。米德提出,自我可以分为作为意愿与行为主体的“自我”和作为他人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的“客我”^[35]。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客我是在社会互动中产生和发展的,是通过概括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而形成的,往往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社会界定^[36]。个体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定义自己,以及对自己的评价,取决于他人对自己的社会定义。然而,本研究发现,如今的青年群体不再局限于用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来定义自己,而是主动参与社会评价标准的建构中来,重构“客我”。正如受访者 B3 所说:“之前我十分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和态度,生怕自己做的有哪点不符合社会规范,被人家说是不伦不类的怪人,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所谓的这些条条框框就是

给人内耗的工具,与其在别人的评价与目光中内耗自己,不如自己给自己制定评价标准,你的标准不是标准,我的才是。”愤怒背后是青年群体有意识地在自己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建构社会对个体价值的定义,并推动其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扩散,以寻求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合法性认可。

4. 媒介化变革:愤怒在网络媒介环境中的嬗变

首先,网络媒介的信息流动机制深刻地变革着愤怒的传播样态与情绪体验。美国学者卡斯帕森提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他认为:未知的风险在经过社会放大效应的影响下,可能会超出原始事件的影响范围。构成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系统是决定风险性质和重要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37]。在深度媒介化的今天,媒介环境对风险的传播起着重要的放大作用。网络媒介创设了去中心化的匿名性参与信息传播环境,在匿名心理与求异心理的作用下,人们更加倾向于发表情绪化、极端化的言论,以博取他人的关注,这无形之中加剧了舆情事件的情绪极化,使情绪的传播优先于信息本身的传播,成为网络媒介环境中最显著的可见性和传播力的因素之一。同时,在此次舆情事件中网络自媒体为博取流量而人为地制造矛盾,挑起对立,模拟出“全体青年团结起来维护我们的权益”的拟态舆论环境。在他们的引导下,此次舆情事件被描述为青年群体无故受到其他社会群体侵犯的风险事件,愤怒成了捍卫其群体利益的正义行动。这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群体的情绪体验向社会风险感知的转化,使处于这种媒介环境中的青年群体无法自拔地陷入网络媒体所创设的人为风险情境之中。

其次,网络媒介的信息推荐机制使“信息茧房”以极低的成本转化为“情绪茧房”。网络媒介的流量算法机制使得情绪性信息更容易被算法获取并推荐,从而快速扩散。这导致了网络舆情事件的规模和影响力在媒介的助推下迅速扩大,并将其升级为社会性风险事件。同时,网络媒介的个性化推荐机制也使得公众受困于单一观点的信息茧房之中。在此次舆情事件中,网络上大量的视频和帖子所传播的信息明显倾向于特定立场和情感偏向,刻意地对此次事件进行极端化和风险化渲染。在归因性话语的引导下,青年群体强化了个人的情绪偏见,使自己更加固化在媒体构建的情绪圈中;最终在媒体构筑的风险情境中加剧对舆情事件风险性的想象和记忆,陷入想象风险-体验风险-强化风险感知的情绪茧房,丧失了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力。此时,陷入情绪茧房的青年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通过媒介拟态环境放大后对舆论事件的风险想象。

最后,网络媒介独特的交互机制改变了愤怒的情绪内核,使其由自然生成的抽象情绪转向为建构生成的情绪动力。在情绪茧房效应的作用下愤怒逐渐由情绪释放演化为人在风险情境下的自卫化应激反应。此时,愤怒的情绪特质被媒介与媒体建构化地改写,使其逐渐成为个体内部的一种防御性情感力量。在强烈的情感动力推动下,青年群体开始聚集,形成舆论集群,并以集群形式参与到社会公共议程中来,由此将媒介化的愤怒从单纯的个体情绪表达升华为维护群体利益、表达群体价值观念的集体媒介运动。正如受访者Y6、B4所言:“本来并不觉得孔乙己是在说自己,也不觉得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但看到大家都这样义愤填膺好像自己也受了欺负。于是我也不自觉地跟帖了。”“我害怕如果我什么都不说的话,我们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愤怒,才有可能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网络媒介将个人风险体验、风险情境空间、风险话语和风险想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人人身处其中、人人自危”的拟态环境,激发了青年群体对此次舆情事件的风险感知,在风险情境中受众的愤怒情绪被不断强化,发酵成为建构生成的情绪动力,推动着集群性媒介运动的生成,最终在众多风险因素的叠加下引爆舆论,形成网络抗争。

(二) 理论模型建构

理论编码是构建新的概括性理论和理论模型的过程。本研究将基于上述三级编码的结果进行抽象整合,以建构青年媒介化愤怒-社会公共议程参与实践模型,详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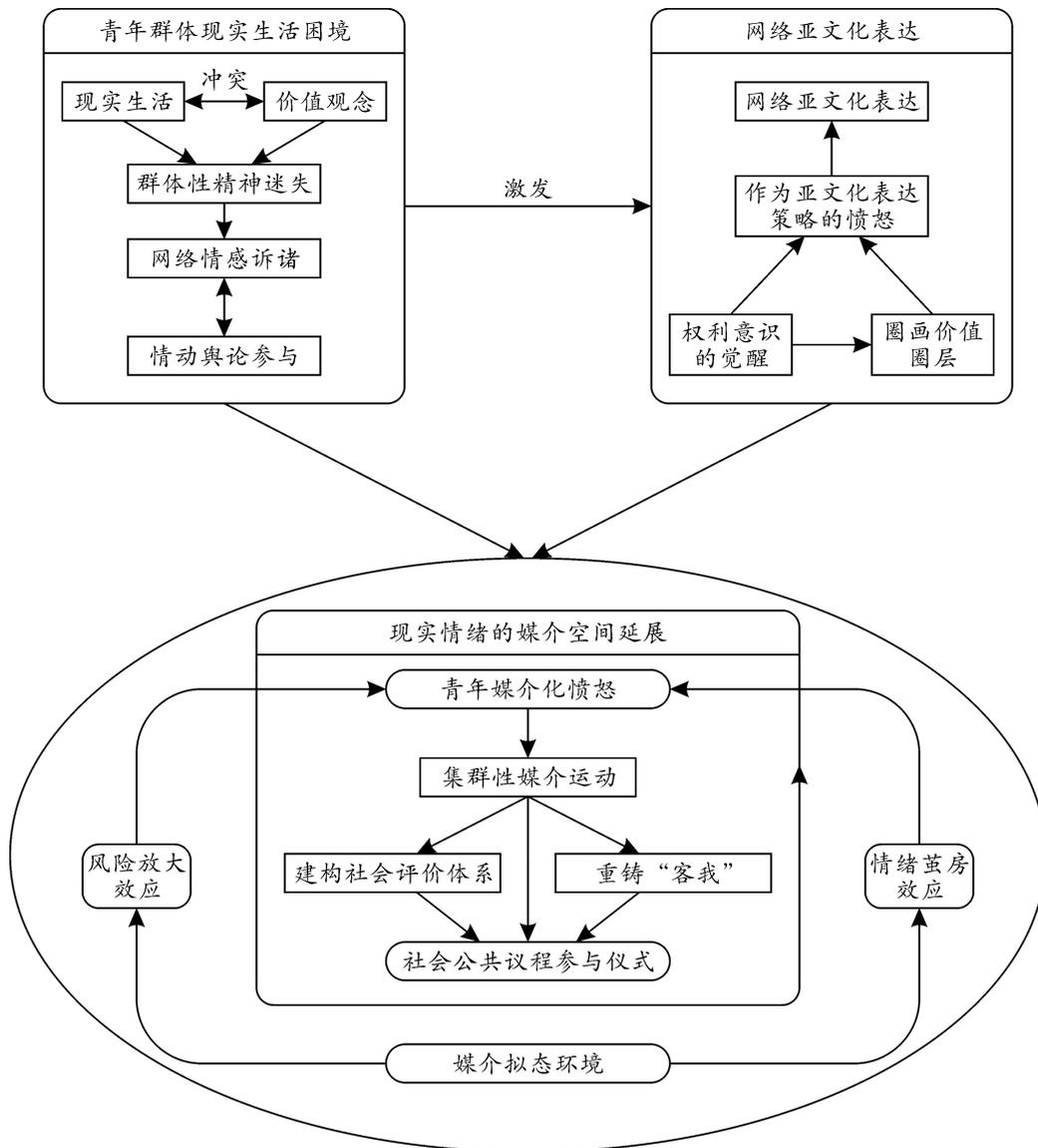


图3 青年媒介化愤怒-社会公共议程参与实践模型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当代青年的媒介化愤怒是青年群体现实社会抗争情绪在媒介空间中的延伸,主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现实社会经济大环境、以亚文化为引子的社会评价权力争夺、网络媒介的拟态环境。具体而言,在当下社会大环境中,青年群体的现实生活体验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产生了冲突,导致了青年群体精神价值层面的认知失调,从而催生出对抗情绪与抗争倾向,这在根本上导致了此次舆情事件的发生。其次,青年群体以媒介化愤怒为策略的激进亚文化表达直接推动了此类事件的发生,并进一步反映青年群体对社会评价体系的挑战和对“客我”的重铸。同时,网络媒介的拟态环境放大受众对舆情事件的风险性感知,激化青年群体的愤怒情绪,使得他们陷入情绪茧房,最终催化此次舆情事件的发酵。

媒介化愤怒成为青年群体网络社交的一种工具,是他们寻找价值观念共同体,组建网络舆论集群,并以集群形式参与社会公共议程,表达群体诉求,争求群体利益的要端策略之一。“孔乙己文学”

事件正是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青年群体利用媒介化愤怒戏谑和反抗固有社会评价标准、争夺社会评价权力的一次网络集群行为。网络媒介使用成本的低廉性特征、之于参与讨论成员而言的匿名性特征、破除时空阻隔的开放性特征,使其展现出一种以往的公共空间不曾具有的可供性,为群体动员、群体讨论、群体规模化表达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捷性。因此,未来我们亟须反思愤怒在媒介空间中的变异,探究如何在社会舆情事件中合理利用网络媒介特质和话语转换策略,有效地创设与青年群体良性沟通的话语,打破青年的情绪茧房,将成为化解由媒介化愤怒引发的舆论抗争的关键。

参考文献:

- [1] A. I. P. Daniel, L. G. Montserrat.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Spaces on Emotional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22, 27(1): 73-90.
- [2] 郁涛. 新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网络舆论表达的特点及心理机制.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3: 3.
- [3] 徐翔. 新浪社会新闻传播中的“情绪偏好”效应与特征研究——基于新浪社会新闻的网络挖掘与实证分析. *国际新闻界*, 2017, 4: 76-94.
- [4] J. B. Kay. Introduction: Anger, Media, and Feminism: The Gender Politics of Mediated Rage.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019, 19(4): 591-615.
- [5] 郭小安. 舆论引导中情感资源的利用及反思. *新闻界*, 2019, 12: 27-37.
- [6] 青平, 张莹, 涂铭等. 网络意见领袖动员方式对网络集群行为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的实验研究. *管理世界*, 2016, 7: 109-120.
- [7] S. Y. Lee, Y. See. Does Tone of Comments Matter: Exploring the Role of Uncivil Comment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 on Weakening Belief in Fake News and Eliciting Anger.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23, 74(6): 515-531.
- [8] 苏涛, 彭兰. 虚实混融、人机互动及平台社会趋势下的人与媒介——2021年新媒体研究综述. *国际新闻界*, 2022, 1: 44-60.
- [9] 朱天, 马超. 互联网情绪传播研究的新路径探析.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6: 139-144.
- [10] 马向真. 愤怒情绪生成为社会心态的逻辑与治理.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 22: 52-59.
- [11] 计卓琳, 吉久明. 网络用户情感茧房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现代情报*, 2024, 3: 70-80.
- [12] 郭小安. 网络抗争中谣言的情感动员: 策略与剧目. *国际新闻界*, 2013, 12: 56-69.
- [13] 和晓, 毛伟宾, 陈嘉仪等. 社会分享媒介与反馈类型对情绪性事件情绪强度变化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 4: 774-779+785.
- [14] K. D. Harber, D. J. Cohen. The Emotional Broadcaster Theory of Social Sharing.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24(4): 382-400.
- [15] 王佳鹏. 从替代羞耻到集体义愤: 公共舆论及其媒介建构的情感机制. *新闻界*, 2019, 2: 39-45.
- [16] W. J. Brady, K. McLoughlin, T. N. Doan, et al. How Social Learning Amplifies Moral Outrage Expression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 *Science Advances*, 2021, 7(33): eabe5641.
- [17] 徐磊, 王庆军. 体育热点事件中网络情绪表达的社会文化归因及其影响因素——以2020年孙杨兴奋剂判罚事件为例. *体育与科学*, 2021, 6: 103-110.
- [18] 尹弘飏. 情绪的社会学解读.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3, 4: 108-114.
- [19] 洪杰文, 朱若谷. 新闻归因策略与公众情感唤醒——当代热点舆论事件的情感主义路径.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6, 4: 120-129.
- [20] 庞金友, 赵洁.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 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社会科学*, 2023, 7: 99-109.
- [21] 袁光锋. 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 一个分析框架.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2: 105-111.
- [22] 袁光锋. 迈向“实践”的理论路径: 理解公共舆论中的情感表达. *国际新闻界*, 2021, 6: 55-72.
- [23] 刘伟, 闫曼卿. 数字交往时代青年舆论极化的意识形态隐忧及其应对策略. *青年学报*, 2023, 1: 51-58.
- [24] 阎国华, 何珍. 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 旨归、困境与进路. *齐鲁学刊*, 2023, 6: 45-55.
- [25] E. Vigoda. From Responsiveness to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Citizen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2, 62(5): 527-540.

- [26] 袁光锋. “众怒”的年代:新媒介、情感规则与“愤怒”的政治. 国际新闻界,2020,9:6-22.
- [27] B. Glaser, A.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Chicago: Aldine, 1976:24.
- [28] 贾旭东, 衡量. 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 管理学报, 2016, 3:336-346.
- [29] H. Silverstein, C. Stauss, J. Corbin. Basic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2nd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8:128.
- [30] 漆亚林, 王俞丰. 基于话语分析的青年网络政治表达.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8, 2:95-101.
- [31] 孟利艳. 青年网络混合型抗争的运作逻辑——一项基于 NVivo11.0 的扎根理论研究.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4:9.
- [32] R. M. Bagby, J. D. A. Parker, A. S. Bury. A Comparative Citation Analysis of Attributio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0, 16(2):274-283.
- [33] B. Friedma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How Public Opinion Has Influenced the Supreme Court and Shaped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 [34] J. P. Williams, H. Copes. “How Edge Are You?” Constructing Authentic Identities and Subcultural Boundaries in a Straightedge Internet Forum. Symbolic Interaction, 2011, 28(1):67-89.
- [35] G. H. Mead, Mind, Self &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Philosophy, 1935, 10(40):493-495.
- [36] 马向真. 自我同一性危机与道德选择多元化. 伦理学研究, 2004, 6:33-36.
- [37] R. E. Kasperson, J. X. Kasperson.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and Attenuation of Risk.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6, 545(1):95-105.

The Gen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Youth's Media Anger: Based on the Rooted Research of “Kong Yiji Literature” Event

Liu Mingzheng, Wang Shuo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Kong Yiji Literature” incident is a typical case of youth's media-oriented anger and the study of this incident is conducive to sort out the evolution path of youth's media-oriented anger and summarize the deep social and cultural attribution behind it. Based on the rooted theory an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path evolution diagram of youth's media-oriented anger an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youth's media-oriented anger and social public agenda participation practice, and extracts the deep-seated social and cultural attribution behind youth's media-oriented anger. It is found that media anger is a media manifestation of the real emotions of young people,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confusion caused by the conflict between real life and values, and extends the cluster media movement of re-creating “customer and self” in the media space. The network media plays the role of risk amplifier and emotional fermentation dish in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mediated anger, and promotes the mediated change of anger. With the deepening of social mediatization, mediatized anger may become a dominant event in the network media space. How to break the emotional cocoon of young people, use th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and relieve the anger of media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us to solv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ediated anger; youth opinion participation; emotional opinion; grounded theory

■收稿日期:2023-11-03

■作者单位:刘鸣箏,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王 硕,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刘金波